

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教材系列



English-Chinese Interpreting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英汉口译理论与实践

江晓梅 主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013044699

H315.9
755

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教材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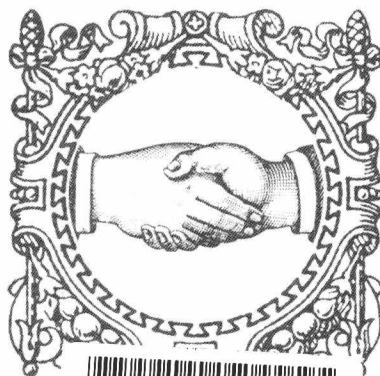
English-Chinese Interpreting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英汉口译理论与实践

主 编 江晓梅

编写人员 (排名不分先后)

江晓梅 张 林 侯 润 周 琼 张 睿
常 娟 达 惠 王 瑰 周赞赞



北航

C1652380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汉口译理论与实践/江晓梅主编.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5
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教材系列
ISBN 978-7-307-10710-6

I. 英… II. 江… III. 英语—口译—高等学校—教材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9555号

责任编辑:罗晓华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通山金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9.75 字数:227千字 插页:1

版次: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0710-6 定价:22.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言

口译是一种运用语言的复杂交际活动,它牵涉到个体的脑神经活动、心理活动、语言运用方式等认知活动,口译理论正是揭示隐含在口译活动现象背后认知基础的理论工具。《英汉口译理论与实践》尝试从多角度引介和探究口译理论与口译实践的关系,以帮助口译学习者掌握口译基本技能,培养口译理论意识,运用口译理论知识进一步认识口译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英汉口译理论与实践》为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教材,主要针对翻译专业本科学生、英语专业本科学生、翻译专业硕士生或其他对口译理论与实践感兴趣的学习者。

《英汉口译理论与实践》一书由八个章节组成,即口译历史回顾、口译基本原理、口译研究方法、口译研究模式、口译测试、口译与语言学、口译与语用学、口译研究发展趋势。这八个章节看似独立又相互关联,共同构成口译理论与实践的基本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引介、梳理和探究有助于口译学习者认识口译理论的本质和规律,基本掌握口译理论的发展起源、进程和方向。

《英汉口译理论与实践》主要具备如下几个特点:

(1)在引介理论的同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英汉口译理论与实践》作为口译研究入门教材,在教材编写上,力求做到在讲解理论的基础上配以实例说明,以帮助学习者迅速领会理论概念,掌握口译理论基础知识,并学以致用。

(2)从多维度引介和探究口译理论与实践,与口译研究最新发展同步。当今口译研究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跨学科、跨地区研究成为口译研究的新范式。《英汉口译理论与实践》引介最新的口译理论研究成果,以拓展学习者视野,帮助学习者学会借鉴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揭示口译现象,认识口译本质。

(3)难易度适中,可读性强。《英汉口译理论与实践》作为口译研究入门教材,力求用简洁通晓的语言讲述复杂的理论,深入浅出,尽可能避免理论的枯燥性阻碍阅读兴趣,同时也注意避免理论的过度简化导致对现象解释的模糊。

(4)练习题设计丰富,突出培养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英汉口译理论与实践》的每一章节后配有练习题,形式多样,既有文献综述,也有实例分析,既有紧扣教材的问答,也有课外丰富的文献查询训练任务。丰富的练习题形式重点培养学习者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英汉口译理论与实践》教材一共由八个章节组成,可供教师和学习者一学期使用。我们建议每周课堂教学时数为二课时,每两周至三周可完成一章节内容。当然,教师应根据具体教学进度,灵活处理教材。

江晓梅负责本教材的框架构思、体例设计、第三章编写和全文修改定稿。周琼负责第

一章的编写工作，常娟、王瑰负责第二章的编写工作，侯润负责第四章的编写工作，周赟赟负责第五章的编写工作，张林负责第六章的编写工作，张睿负责第七章的编写工作，达惠负责第八章的编写工作。李璇、姚雪琼、杨牟参加了相关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本教材例句大多注明出处，也有例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找到出处，教材编写者对于注明出处和没有注明出处的选文作者均表示感谢。

在本书的策划、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武汉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编写《英汉口译理论与实践》教材的过程中，编者深感任务艰巨、能力有限，还有很多未知的问题和现象等待探索，目前编者只是做了初步的尝试。编者期待今后做更多努力，与其他同仁一道探索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出现疏漏和缺憾，诚望读者和同行批评指正。

江晓梅

2013年3月

目 录

第一章 口译历史回顾.....	1
第一节 口译的起源.....	1
第二节 口译的发展.....	4
本章小结.....	9
阅读文献推荐	11
练习题	11
第二章 口译基本原理	12
第一节 口译基本概念	12
第二节 口译基本类型	13
第三节 口译认知过程	15
第四节 口译基本策略	16
本章小结	32
阅读文献推荐	32
练习题	33
第三章 口译研究方法	36
第一节 实验法	36
第二节 问卷调查法	38
第三节 访谈法	42
第四节 日记法	44
第五节 回顾法	46
第六节 研究数据分析	49
本章小结	54
阅读文献推荐	55
练习题	55
第四章 口译研究模式	57
第一节 释意派理论研究模式	57
第二节 认知处理研究模式	59
第三节 口译精力分配模式	63

第四节 口译神经语言学研究模式	67
第五节 口译互动模式	69
本章小结	72
阅读文献推荐	72
练习题	72
第五章 口译测试	76
第一节 口译测试类型	76
第二节 口译测试内容	77
第三节 口译测试质量评估标准	80
本章小结	83
阅读文献推荐	84
练习题	84
第六章 口译与语言学	86
第一节 口译语境	86
第二节 口译衔接	91
第三节 口译连贯	96
第四节 口译单位	103
本章小结	105
阅读文献推荐	105
练习题	105
第七章 口译与语用学	108
第一节 口译合作原则	108
第二节 口译礼貌原则	112
第三节 口译图式	115
本章小结	121
阅读文献推荐	122
练习题	122
第八章 口译研究发展趋势	125
第一节 口译实证研究发展趋势	125
第二节 口译跨学科研究发展趋势	127
第三节 口译跨文化研究发展趋势	129
第四节 基于口译形式多样化的研究发展趋势	129
第五节 口译职业化研究发展趋势	131
本章小结	132

阅读文献推荐.....	132
练习题.....	132
附录 国际会议口译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	134
参考文献.....	138

第一章 口译历史回顾

口译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或社会活动,是人类原始部族为了突破自我封闭的社会形态,满足人类各民族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交流的需要,突破不同语言产生的壁垒,而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不同的语言给人们带来了交流的障碍,这就需要懂两种语言的人帮助完成沟通,这种人被称为“中间人”。口译在形成初期可能表现为“操不同语言的部族或民族之间的某种非职业的、粗糙的、附大量手势语且谈不上任何口译技术或技巧的终结性口头交流,主要发生在各个部族或民族的辖土边缘地带”(鲍刚,2011:1)。但是当语言交流进入到一个更高层次,需要涵盖更深层次的文化、特定礼节与礼仪,或某种专业知识时,就需要一些特殊的口译技能,于是产生了口译职业。口译职业化的发展是口译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口译职业特点促进了口译全方位的发展。

口译历史还离不开口译研究的发展。西方口译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而中国的口译研究则相对起步较晚,初步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口译研究才真正展开并迅速发展。对比中西方口译研究,可以发现两者经历了类似的发展历程,拥有相近的研究特点。但是基于不同的社会环境、研究环境、学术传统、研究价值取向,中西方口译研究在研究主题、实施方法、理论构建等方面又存在明显不同。本章将简要回顾口译活动产生以及口译研究发展的演进历程,包括口译活动起源、口译职业化起源与发展、口译教学与译员培训以及当代中西方口译研究发展阶段及特点四个问题。

第一节 口译的起源

一、口译活动溯源

西方最早被记录下来的口译活动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埃及,象岛(Elephantine Island)^①的王子就被称为“译员总管”(overseer of dragomans)(Hermann, 2002),统管国家对外交流,负责管理埃及译员的日常工作。公元前1546年,孟斐斯城(Memphis)^②霍伦海布法老将军(Horemheb)就开始雇用专职译员为其服务(Delisle & Woodsworth, 1995)。公元前30年左右,古罗马帝国时代的译员就已经开始定时领取薪金。公元649年,拉特兰会议(The Lateran Council)^③议会就出现了专门为朝廷权贵提供服务的早期会议译员(Pöchhacker, 2010)。15世纪法国人杜布瓦(Jacques Dubois, 1478—1555年)首先倡导培养口译员并设立口译员培训学校,以促进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信

徒之间的沟通和交流。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曾派遣大批美洲印第安人去西班牙学习西班牙语,并将他们培养成口译员,为西班牙王室的统治服务。16世纪时,法国和奥地利在与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 1453—1922年)^④展开外交时,曾派驻君士坦丁堡的“语言工作者”作为口译员参加到外交工作中。17世纪时,法国的“常驻译员”扮演着法国和加拿大土著部落之间主要贸易人和谈判人的角色(Pöchhacker, 2010)。

中国的口译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夏商时期(公元前2100—前1100年),中国同相邻各国交往,出现了外事口译活动。后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前中央政府为了将更多原住民族纳入统一的中华文明,遴选了通晓外族语言的官员为翻译,加强与边境少数民族部落的沟通。《后汉书》中详细记载了益州刺史朱辅^⑤及其属下官员兼翻译田恭^⑥的翻译活动,书中还记载了他们二人及当时的皇帝对翻译活动的见解。朱辅主张“吏译传风,大汉安乐”,即将中原的繁荣景象通过翻译传递给外族人。在田恭看来,翻译的职责远远超过了语言层面的传递,他深谙翻译的政治作用,在翻译活动中有着明显的政治立场偏向(黎难秋, 2002)。他长期往来于汉朝和外族之间,掌握了外族的语言文化,在汉朝与外族的外事沟通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可视为中国早期外交翻译的雏形。

在隋代(公元581—618年),军事领域开始出现口译活动。据《隋书》记载:“明年(大业四年,即608年),帝复令(朱)宽慰抚之,流求不从……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至高华屿……又一日便至流求。初(陈)稜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人慰喻之。”朱宽^⑦在炀帝时任羽骑尉^⑧,陈稜^⑨则为武贲郎将^⑩。这段文字记载了公元608年我国与琉球通使及交战的史事,其中提到了通晓琉球语的昆仑人做翻译的情况。唐代永泰年间(公元765—766年),西域回纥、吐蕃等国时常骚扰我国边境,《旧唐书·回纥传》中也有多处明确记载军事活动中翻译活动的史实。

东汉(公元25—220年)开始出现佛经翻译,自此在我国绵延千余年。在佛经翻译活动中,口译活动是十分重要的部分。尤其是在早期的翻译活动中,如果没有口译人员的参与,佛经汉译几乎无法完成。佛经翻译中的口译活动与传经的过程或方法紧密相关,不同时期,译经方法不尽相同。东汉至西晋为初始期,主要由西域各国及印度来华的僧人从事翻译。在朝廷允许华人为僧后,逐渐有华僧参与翻译。来中国的外国僧侣很少携带佛经原本,翻译时多数依赖个人记忆,口诵经文原文,经人记录再翻译为中文。

明代(公元1368—1644年)开始,我国大量翻译引进外国科学书籍,明初,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钦命翻译《明译天文书》和《回回历法》两本书,国人李翀^⑪、吴伯宗(1334—1384年)^⑫参与翻译,但他们并不通晓阿拉伯语,所以极大的可能是由回回大师马哈麻^⑬、马沙亦黑^⑭口译,李翀、吴伯宗笔述。明初的马哈麻与马沙亦黑应是史书可查的较早的可能口译者。

清代末年,林纾(公元1852—1924年,字琴南)翻译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引起文坛轰动。但林纾其实是在王子仁(公元1863—不详)口译的基础上笔述而成的。1901年林纾又与魏易(公元1880—1930年,字冲叔)以同样的方式合作译述《黑奴吁天录》,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1898—1924年,不懂外文的林纾,全凭与口译者的合作,译成外国文学作品180多种,获得后世很多文学家的高度评价。林纾笔述固然关键,而口译的“信”恐怕也是功不可没。

20 世纪以后,随着大量留学日本与欧美的学生回国,以及国内逐渐培养出本土的外语人才,我国科学书籍、文学书籍翻译活动的口译笔述方式才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

二、“译员”一词溯源

1. Interpreter

“译员”一词语义学词源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interpreter”(译员)一词源自拉丁语“*interpres*”,即“解释者,解释模糊不清的话语的人”。一些学者取“interpreter”后半部分,即“*preter*”,认为这部分是由“*partes*”或“*pretium*”衍生而来,含“中间人”、“中介”、“商业联系人”等含义(Hermann, 2002)。也有学者认为该词源自公元前 1900 年亚述王国(Assyria)和巴比伦王国(Babylonia)古闪米特语系(Semitic)阿卡得语(Akkadian)中的“*targumanu*”一词(Vermeer, 1992),意指从事口头传译工作的人。无论这个词的语义学词源如何,拉丁语中“*interpres*”(译员)一词符合现在对口译的理解,指“解释的人”或“就难以理解的事物对他人做出解释的人”。

2. Dragoman

“dragoman”(口译员)一词也源自公元前 1900 年亚述王国和巴比伦王国所使用的阿卡得语(Akkadian),意为“做口译的人”。维基百科上对“dragoman”一词有这样的解释:“dragoman”是指在讲土耳其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等语言的国家之间担任口译、笔译以及官方向导的人。他们主要承担中东政府官员、欧洲大使馆官员、领事馆、副领事馆以及各类贸易组织之间的语言交流任务。作为一名“dragoman”(口译员),必须熟练掌握阿拉伯语、土耳其语以及欧洲各国语言,才能胜任其职责。

3. 寄、象、狄鞮、译

口译员这一职业在我国存在也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礼记·王制》篇里记载:“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这里提到的“寄”、“象”、“狄鞮”、“译”,都是指通译语言的人。当时中原文化较为发达先进,所以“通达志欲”只限于言语的沟通,也就是所谓的口译。

4. 舌人、通事

《国语·周》对“译员”作了这样的注解:“舌人,能达异方之志,象胥之职也。”《癸辛杂识后集·译者》也对译员这一职业作了这样的解释:“译,陈也;陈说内外之言皆立此传语之人以通其志,今北方谓之通事。”《后汉·和帝纪》提到了当时对译者的需求:“都护西指,则通译四万。”而《东京赋》则赞颂了译员的能力:“重舌之人九译。”简而言之,舌人、通事是指通晓几门语言的特殊人才。

三、口译职业溯源

尽管 20 世纪以前,就有少量译员为政府和机构从事双语或多语交际工作,但直到 1919 年巴黎和会召开,现代口译职业化才真正开始。在 1919 年巴黎和会上,著名历史学家、伦敦大学教授保尔·芒图(Paul Mantoux, 1877—1956)亲自为同盟国领导人做口译,标志着国际口译现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即从聘用自然口译员转换为聘请掌握专业背景知

识和口译技能的职业口译员为国际会议服务。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短时记忆、口译理解、口译笔记、应对策略等基本口译技能得到译员们的广泛应用,并在此后得到普及。从此以后,口译逐渐变成了职业化的双语言或多语言交际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纽伦堡审判是国际口译现代史的另一重要转折点。1945年11月至1946年10月,“二战”结束后,盟军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史称纽伦堡审判(Nuremberg Trials),历时一年,涉及十余国家,审判规模、涉及人数皆为史上之最。战犯和审判法官来自十多个不同的国家,彼此之间语言不通,需要口译员实时地担负双语或多语交际工作。纽伦堡审判的口译工作采用了源语、译入语近乎同步的方法,即同声传译,以保证在大量的听证、辩护、审判工作中,在源语话语结束时同时结束译入语传译,以提高工作效率。同声传译在纽伦堡审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之后在世界各国得到推广,标志着口译职业化发展的新方向。

第二节 口译的发展

一、口译的职业化发展

口译的职业化发展首先表现在口译职业标准的确立。1945年10月,联合国组织正式宣告成立。联合国的创立带动了各类全球性和地区性组织的出现,各国之间的交往日渐频繁,双语和多语交际活动日盛,对职业口译员的需求增大。同时对这些语言之间转换的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要求愈加严格,普遍要求口译员训练有素、职业行为规范、职业意识强、具备出色的专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等,这些职业标准是口译职业化发展的重要条件。

口译的职业化发展还表现在口译工作者协会或组织的建立。1953年,“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FIT—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ducteurs,中文简称“国际译联”)作为第一个国际翻译者的综合性工作组织,在法国巴黎成立,其成员为各国口笔译工作者协会会员。同年,国际口译工作者在日内瓦成立了自己的协会组织,即“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AIIC—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ference Interpreters),该协会是会议口译员唯一的全球性专业协会,负责审查、认定会议口译员的专业资格,制定会议口译员的从业规则、道德规范和专业培训标准等,该协会制定的会议口译员道德准则受到职业口译员的广泛推崇和接受(参见附录)。

此外,口译的职业化发展还表现在口译市场的日渐成熟。目前口译员群体数量发展迅速,既有政府机关专职口译人员,也有口译自由职业者,还有部分兼职译员,他们活跃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的各个方面,为促进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翻译市场需求更是发展迅猛。据统计,仅2011年中国翻译市场的年产值就达1500亿元,翻译已逐渐成为全世界最热门的产业之一,日益增长的口译市场需求和相对有限的口译员资源必然会促进口译的职业化发展。

二、口译教学与译员培训发展

1. 西方口译教学与译员培训发展

(1) 西方主要翻译学院及口译培训中心

西方口译教学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独立学科地位。欧洲著名的高级翻译学院和口笔译教学单位主要有法国的巴黎高等翻译学校(现称巴黎第三大学高等翻译学院, ESIT—Ecole Supérieure d'Interprètes et de Traduction, Université Paris III)、瑞士日内瓦大学翻译学院(École de traduction et d'interprétation, Université de Genève)、意大利特里斯特大学翻译学院(SSLMIT—Scuola Superiore di Lingue Moderne per Interpreti e Traduttori, Università di Trieste)以及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口笔译教学部(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Newcastle University)等。美国主要有乔治敦大学口笔译教学部(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School of Georgetown University)、蒙特雷国际研究院高级翻译学院(Graduate School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he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等。巴黎高等翻译学校始建于1957年10月,是全世界最早有权授予翻译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高校。借鉴神经生理学、实验心理学等研究成果探究口译现象的巴黎释意派理论就诞生于此。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院高级翻译学院为美国为数不多的可以授予硕士学位的翻译学院之一。该学院为联合国、欧盟以及各个国家培养了大批同声传译译员。除此之外,其他著名的口译研究和培训中心还包括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翻译和跨文化研究所(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翻译研究中心(Centre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Vienna)、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的社区口译研究中心、美国加劳德特大学翻译系(Department of Interpretation, Gallaudet University)的手语传译研究中心、韩国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外国语言翻译中心等。

(2) 西方口译教学模式演变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几乎所有的口译教学项目和机构都以培养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技巧为目的。第一代的口译教师本身亦是成功译员,因此形成了一种经典的口译教学模式,即“学徒式”(apprenticeship)的教学模式(Pöchhacker, 2010)。这种教学模式主张以师徒相传的方式向学生传授口译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模拟真实口译任务场景为其主要教学形式。到了20世纪80年代,“学徒式”的教学模式受到质疑。口译教学中开始出现寻求更为科学的口译教学方法的呼声,认知过程范式(cognitive process-oriented paradigm)的代表人物将他们的模式应用到口译员的技能培训中,取得了突出的效果(Lambert, 1988; Riccardi, 1996; Kalina, 1998; Gile, 1995; Moser-Mercer, 2000)。依据认知过程范式,口译教学应该以“情景认知”(situated cognition)、“反思性实践”(reflective practice)以及“认知式传授”(cognitive apprenticeship)为指导,注重以学生为中心和以互动为导向的教学方式,通过分解口译技能、强化口译策略学习、增强管理认知负荷及专业能力发展等,提高口译学习者的口译能力和译员的专业素养。

2. 中国口译教学与译员培训发展

(1) 中国主要翻译学院及口译培训中心

中国口译教学发端较晚,一般认为中国口译教学开始于1979年联合国译训班在原北京外国语学院开班教学。20世纪90年代后,翻译作为独立学科的呼声日渐强烈,越来越多的培养高级翻译人才的教育机构出现,北京、上海、广州、厦门、西安、重庆、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的高校也纷纷成立了翻译院系。其中最为著名的高级翻译学院有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台湾辅仁大学翻译研究所等。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为国内最早的翻译学院,主要培养英汉同声传译人才和其他高级口笔译人才,为政府部门、各类国际会议输送了高层次的口译人才。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建立了“同声传译”基地,并设立了中国第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翻译学学位点,招收翻译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利用自身外贸金融学科等方面的优势,为外事、外贸单位及高档次国际会议培养了各类高级口译人才。台湾辅仁大学翻译研究所培养具有专业口译水准的职业口译员为教学宗旨,其口译教学承袭欧美口译教学传统,以专业性和浓厚的精英色彩而独树一帜(郭兰英,2007)。除此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国内大学翻译学院、翻译系、口译培训机构在培养具备双语或多语水平的学员的口译职业能力方面做出了努力。

(2) 中国口译教学模式演变

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内口译教学模式主要呈现为以教师为主导的知识传授型教学形式,通常是口译教师朗读口译练习材料,学生课堂操练,教师适当点评。这种口译教学模式呈现的是静态的和程序化的过程,教学方法流于机械,忽略了口译的即时性、信息来源和传递渠道的多层次性以及口译语言的口语化等特点,其教学效果并不理想。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口译教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态势。口译教学理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先后出现了以技巧训练为中心,以语言训练、知识习得、跨文化交际能力为辅助的“厦大口译训练模式”,以口译技能、口译专题、双语语言训练和口译实践等多条主线有机结合的“广外口译教学模式”(仲伟合,2001),以“微格教学理论”为基础,将口译教学过程细分为单一的口译技能,再逐项培训的“微格口译教学模式”(王海生,2005),还有将口译教学分为译前准备(Preparing)、现场口译(Performing)和译后评估(Packaging)三个阶段的“3P”口译教学模式(刘建珠,2012)等。这些口译教学模式都反映了以口译技能训练为中心,以语言训练、知识习得、跨文化交际能力为辅助的口译教学新理念。

三、口译研究发展阶段及特点

1. 西方口译研究发展阶段及特点

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至60年代初期,该阶段的口译研究主要表现为译员的个人经验总结。在日内瓦和布鲁塞尔工作的一批译员和口译培训者基于对个人口译实践的思考和总结,得出了一些带有个人经验色彩的初步认识。这种认识构成了口译理论的早期萌芽,标志着西方口译研究的开端(张吉良,2011)。这些认识主要表现在对译员的职业道德与专业素养、口译困难与应对策略、目标语表达技巧、交传笔记原则、职业译员的工作语言、听说时差、术语对口译的影响、口译的类型等方面。在这个阶段出版了第一本口译专著——《口译须知》(*The Interpreter's Handbook*, 法文原名 *Manuel de L'interprete*,

1952), 由瑞士人让·赫伯特(Jean Herbert)撰写。该书是一部基于经验研究的代表作, 介绍了口译的各种技巧和译员的专业素质培养, 至今仍然被众多口译初学者视为必读书籍。四年后, 赫伯特在日内瓦口译学院的同事让-弗朗索瓦·罗赞(Jean-Francois Rozan)出版了《交替传译笔记》(*Note-taking in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1956), 这本手册对口译教学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总的看来, 第一阶段口译著述不多, 且多数以口译实践者个人经验和直觉为主, 具有零散性、局部性和感悟性的特点, 缺乏对研究信度和效度的思考, 研究方法也欠规范。

第二阶段为20世纪60至70年代初期, 该阶段的口译研究开始注重运用实验方法研究口译现象。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学者, 如皮埃尔·奥雷洪(Pierre Oléron)、弗里达·戈德曼-艾斯勒(Frieda Goldman-Eisler)、大卫·杰弗(David Gerver)、安妮·特雷斯曼(Anne Treisman)等, 尝试运用认知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理论探索口译问题, 分析源语、噪音、语速、停顿、听说时间差等变量对口译的影响及常用对策等。法国心理学家皮埃尔·奥雷洪(Pierre Oléron, 1965)进行了首个针对同声传译的实验, 进行了源语和译员产出之间的时滞测量, 继而发现同声传译是一项涉及多个难以把控的变量的复杂活动(Pöchhacker, 2010)。弗里达·戈德曼-艾斯勒(Frieda Goldman-Eisler, 1967)研究了同声传译译员的即兴话语产出, 但她的研究重点是停顿。大卫·杰弗(David Gerver, 1971)进行了噪声影响、输出速度和译员记忆表现的实验, 为其提出的同声传译信息处理模型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的研究已经呈现出跨学科的倾向, 然而, 研究重点“只在口译的认知和心智过程, 还没有意识到口译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仅仅取决于对讲话人单方面的话语意义和结构的理解和表达”(任文, 2010: 21)。这些研究尽管都有系统的理论作为指导, 研究方法也能依据客观数据而更加科学, 但这一阶段的研究者大多在实验室进行口译相关研究, 与口译实践有所脱离。

第三阶段为20世纪70至80年代中期, 该阶段的口译研究开始转向结合口译实践探索口译理论。由于第二阶段基于实验室的研究脱离了口译实践, 因而受到了口译实践者与口译教师的质疑。于是很多口译实践者开始结合自己的口译实践对口译现象进行研究和分析, 以探索口译活动的本质。这一阶段最有代表性的口译理论研究成果为巴黎高等翻译学校两任校长达妮卡·塞莱斯科维奇(Danica Seleskovitch)和玛丽亚娜·勒代雷(Marianne Lederer)创立的释意派理论(Theory of Sense, or Interpretive Theory, 法文原名 *théorie du sens*)。释意派理论将口译视为一个动态的交际过程, 试图解剖口译的意义传递现象, 强调口译以意义为中心, 而不是字词和语言结构的对译。释意派理论对语意而非语言形式的强调对口译实践和培训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这一阶段的口译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从早期的个人经验总结提升到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对口译现象进行理论思考, 极大地提高了口译研究的科学性。但是由于该阶段研究者摒弃了实验法, 主要采用直觉思辨法探讨口译认知心理过程, 因此他们的相关研究成果并未得到有效验证。

第四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 该阶段的口译研究呈现跨学科研究及实证研究的特点。这个时期的口译研究提倡结合其他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对口译进行多维度、多方位、多层次的实证研究。其中认知心理学与口译理论结合影响最为深远, 成果也最为丰富。大卫·杰弗(David Gerver, 1976)提出了同声传译信息处理模型(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注重研究源语和目标语之间的信息传递, 认为源语的语法结构是造成处理困难的重要因素; 丹尼尔·吉尔(Daniel Gile, 1995) 提出认知负荷模型(The Effort Model), 对译员有限的精力分配问题进行了科学的描述, 合理地解释了译员的错译/漏译现象。在口译神经生理学研究方面, 的里雅斯特学派代表人物、神经生理学家弗兰科·法布洛(Franco Fabbro)和会议口译员兼口译教师罗拉·格兰(Laura Gran)从神经生理学和神经语言学的角度探索口译的认知处理过程, 重点研究译员的大脑侧化(lateralization)现象, 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运用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探究口译现象也是当前口译研究的热点, 主要包括对话口译研究、社区口译研究、法律口译研究、医疗卫生口译研究等。塞西莉亚·瓦登斯约(Cecilia Wadensjö, 1998)提出了以话语分析为基础研究对话互动口译的方法(Pöchhacker, 2010)。还有学者探讨了社区口译、医疗卫生口译、法律口译的概况、作用、培训、标准、评估和认证等方面的问题(Carr, 1997)。这一阶段的口译研究表现出了极强的跨学科研究特色, 拓宽了口译研究视野, 丰富了口译研究方法, 极大地促进了对口译现象的深入研究。

2. 中国口译研究发展阶段及特点

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 该阶段的口译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口译现象的泛论和经验性总结以及对西方口译理论的引介。目前可检索到的最早的口译研究论文发表于《外语教学与研究》, 题名为“口译工作及口译工作者的培养”(唐笙、周珏良, 1958), 重点介绍口译的基本工作程序和译员的素养培训。20世纪80年代开始, 各种以“初探”、“浅谈”命题的口译研究论文开始刊载于各类学术刊物(庞浩, 1979; 葛传槩, 1980; 李越然, 1980; 徐名阳, 1980; 齐赐玉, 1984; 胡庚申, 1986; 朱柏桐, 1986)。总体上, 这一阶段的口译研究缺乏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意识, 深层的理性分析和系统考察明显不足, 带有浓厚的经验性特征。但同时期, 有学者开始译介西方口译专著(孙慧双, 1979; 孙慧双, 1982; 张晨君, 1984), 拓展了中国口译研究视野, 为口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 该阶段的口译研究呈现出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口译理论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果; 二是口译技能与口译教学研究更加系统化; 三是跨学科研究和实证性研究促进了对口译现象的多层次、多角度理解。在口译理论探索方面, 鲍刚(1998)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口译理论专著——《口译概论》。作者基于法国释意派理论框架, 运用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神经学、信息理论以及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对口译活动所涉及的源语理解、思维过程、译语表达、口译的口语特点等一系列现象进行探讨, 揭示了口译现象的内在机制。刘宓庆(2004)在《口笔译理论研究》一书中, 运用语言学、传播学和认知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解释口译现象, 特别强调了口译的跨语言文化的社会传播功能。此外, 这个阶段还继续译介西方最新口译理论, 其中, 法国释意派口译理论在中国译界得到较为系统的译介和研究, 使其成为对中国口译理论研究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汪家荣、李胥森、史美珍, 1990; 刘和平, 2001)。

在口译技能研究方面, 口译技巧研究逐渐被口译能力研究替代(梅德明, 2000; 蔡小红, 2001; 陈菁, 2002), 口译不再被视为一种纯粹的工匠技艺, 口译能力研究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在口译教学方面, 有学者借用释意派理论的基本观点, 拓展了口译教学的理

论框架和实践模式,探索新时期口译教学及口译职业培训模式(刘和平,2001)。还有学者集中研究口译课程体系的构建,提出专业口译教学体系应开设语言技能与语言知识课程、百科知识课程和口译技能课程三大板块课程(仲伟合,2003),以更为全面地培养和提高口译学习者的口译技能和职业素养。

在跨学科研究和实证性研究方面,认知心理学层面的口译研究最受关注,主要集中于探究源语理解的心理过程、口译短时记忆规律、口译笔记认知基础等(冯之林,1997;鲍晓英,2005;江晓梅,2011)。也有研究者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解析口译现象,重点关注口译过程中译员的心理活动、语境与话语的理解、知识的认知和推理、意义传递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性和最佳意义的选择等(莫爱屏,2003;黑玉琴,2003)。还有研究者从功能语言学角度探究口译中的语境与功能,研究特定社会环境对口译功能的影响(李越然,1999;李锦、廖开洪,2002)。此外,社会学理论也被引入口译研究,重点探究口译的交际特点和译员的交际能力(蒋凤霞、吴湛,2011)。作为一种重要的实证性研究方法,口译语料库建设及研究也开始起步。文秋芳、王金铨(2008)建立了“中国大学生英汉汉英口笔译语料库”(Parallel Corpus of Chinese EFL Learners,简称 PACCEL),这是我国第一个学习者英汉、汉英口笔译语料库。基于口译语料库的口译研究开始迅速成为新兴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对口译文本语言特征和口译过程两方面的研究(胡开宝、吴勇、陶庆,2007;张威,2009;胡开宝、陶庆,2010)。总体来说,这个阶段的口译研究方法体现了跨学科研究和实证性研究的特点,多层次、多角度、深入地揭示了口译现象,对深化口译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章小结

本章重点追溯了口译活动产生以及口译研究发展的演进历程,包括口译活动起源、口译职业化起源与发展、口译教学与译员培训以及当代中西方口译研究发展阶段及特点。尽管口译的起源很难准确界定,但一般认为口译活动是为了满足人类原始部族相互交流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1919年巴黎和会上,口译作为一种职业开始受到重视。1945—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口译职业的认同。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国内外各类翻译学院、翻译系相继成立,口译教学与培训模式也不断演进,一切都标志着口译专业技能培训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口译的历史演进还离开口译研究的发展。西方口译研究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从译员个人经验总结到注重运用实验方法研究口译现象,再到结合口译实践探索口译理论,并进行跨学科研究及实证性研究,是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结合的过程。中国口译研究是在借鉴西方口译研究发展成果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从对口译现象的泛论和经验性总结,到对西方口译理论的引介,进而开始口译理论探索,并系统地探究口译技能与口译教学的规律和原则,再到进行跨学科研究和实证性研究,以促进对口译现象的多层次、多角度理解,这一切都印证了中国口译研究发展的特点和取得的成果。口译研究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呈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国内外正在引起不同领域人员的关注。回顾口译历史有利于研究者从跨越百年的口译纵向发展中汲取前进的养料,对比中西方口译的发展与现状也能让研究者理清研究